

试论中国近代“重商”思想

宋 宁

中国近代“重商”思想的兴起，是与甲午战前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分不开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一系列加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展开了以商品输出为中心的经济的侵略。外国商品的不断冲击，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也造成了中国对外贸易入超，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土货滞销。“频年海溢川流，岁出金钱万万，遂使廿一行省无富商，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尤如恒河之沙不可计算”（陈炽《续富国策》卷四）。这种状况，对于初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犹如釜底抽薪，既破坏了货币资本积累，也排挤了民族资本市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些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企图抵制西方经济侵略，自握利权，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于是，提出了以“重商”为核心的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

一

中国近代“重商”思想的有关论述散见于甲午战争前资产阶级改良派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人的论著中。其核心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大力振兴商务，由此带动民族经济的发展，从而

在与外洋竞争中取胜，变民贫国弱为民富国强。

对于如何实现中国的富强，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当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认识不同。以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认为，求国富必须轻赋税以保“有田富民”（即地主）之利，致国强必须“师夷长技”，购造船炮以强兵战。其实质是要求振兴地主经济，扩充军备以“制夷”。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指出，“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他们认为，“治国以富强为本，求强以致富为先”（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富是强的基础，国弱的根源是民贫，故欲求强，必先富民，“民富而国自强”。而富民的实质则在于使商民即工商资产阶级致富。在这一点上，中国近代“重商”思想显示了其阶级属性。

为什么商富能使国强呢？他们认为，“非商富不足以养兵”，“商民可富，饷源可充，中国转亏为盈，转弱为强之基，实在于此”（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同时进一步指出，“商富即国富，并出一途”。在他们看来，虽然“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兴利》），但农之富在谷，商之富在金，盖

商富于农富之上，亦不为“舍本而务末”。因为所谓农之富不过是就“为体”或“为用”而言，即是从使用价值上看的。它可以致富，“而非所以为富，所以为富者，莫金银矿若”（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因此，致国富也就是要获取金银，商之富和国之富是完全一致的。这样，他们在把当作使用价值的财富区分开来的同时，宣布交换价值为最直接的财富，因而是国家经济活动的直接目的。这就推翻了传统的“贵谷贱金”的自然财富观。它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产生。

从上述认识出发，他们进一步指出，“泰西诸国”皆“恃商为国本”，“无不以通商致富”（王韬《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弢园文录外编》）。中国要转贫致富，也必须仿效西方，以举商务为首要。在他们看来，世界已经到了通商“越乎境外”的时代，这是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可违抗的历史趋势，因而闭关独治是不可取的。薛福成说：“盖在太古，民物未繁，商务未兴之时，各国闭关而治，老死不相往来，各享地利而有余。及今天下既以通商为务，设或此衰彼旺，则此国之利，源源而往，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无久而不贫之理。所以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亦势有不得已也。”（薛福成《庸庵全集十种·筹洋刍议》）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方今门户洞开，任洋商百方垄断”，“以各国商船论，其于中国每岁进出口货价银在二万万两上下，约计洋商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以十年计，则三万万，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无怪近日民穷财尽，有岌岌不终日之势矣。然为中国计者，既不能禁各国之通商，惟有自理其商务而已”（同上）。他们将中国贫弱的原因归结于长期

的巨额外贸逆差，认为惟有开关振兴商务才能扭转逆差。因此只要能“通商于泰西各国而自握其利权，如是数年之间，收西商之利而为我所有，则中国日见富矣”（见王韬《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弢园文录外编》；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

他们在指出逆差为中国贫弱原因的同时，还指出，尽管富源在通商，但通商只在一定条件下对国家有利。马建忠首先从进出口贸易额的平衡上说明这个条件，即“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货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货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货者不利”（马建忠《富民说》）。继之，郑观应又从进出口贸易利益分配上做了具体的分析：“夫谓之通者，往来之谓也，若止有来而无往，则彼通而我寒矣。商者，交易之谓也，若既出赢而入绌，则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损矣。”（《盛世危言》初编卷一）因此，“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出口货多，可以从国外吸进金银，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可以防止金银外流，则“未散之财不复散”。使出口货等于进口货，则可“与西商并驾齐驱而潜夺其利”，两不相盈而又互通有无。总之，“商务以畅销土货为要诀”。这些观点就是中国近代“重商”思想的真谛。

至于如何使土货畅销，以敌洋货，他们分析道：“西洋各国，工艺日精，制造日宏，其术在使人获质精价廉之益，而自享货流财聚之效，……所以能致此者，恃机器为之用也”（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三）。由于中国不用机器造物，结果“制造不如外洋之精，价值不如外洋之廉”（《盛世危言》三编卷一）；土洋之间，“工绌相越，贵贱相悬”；“中国货非但不能售于各国，亦不能售于本国”。

“中国之民非但不能成货，以与西人争利，且争购彼货以自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三）。要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用机器进行生产。郑观应指出：“独是商务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盛世危言》初编卷三）所以，“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同上，三编卷一）。只有中国多出一分货，外洋才少获一分利，而中国工商多得一分生计，人民得自食一分力。他们主张，以商为中心而“振百工”，发展以机器制造业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来为华民广生计，开利源，增物业，从而塞漏卮、夺外利，与西人决胜于“商战”。

为了在“商战”中获胜，他们不仅提出要“讲求丝茶之本原”，以增加中国大宗出口商品产量，并进一步提出仿求西方先进技术和方法，甚至引进资金，开采煤铁，造机器，筑铁路，通海运，建电报，兴农事，办公司，开银行，设保险，立学院，育人才。总之，要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方式来发展中国商品经济。

在中国历史上，与封建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传统政策是“重农抑商”，到了近代，这种旨在保护小农经济的政策，就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此时的“商”，实际上是封建社会中萌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抑商”与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直接冲突。但是，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无权，他们所呼吁的民族工商业无力凭借经济力量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自我发展。因此，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不得不求助于官府，要求清政府“切勿薄视商工”，更“不能执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为了证明商民与国家的利益一致，说服当权者变“抑商”为“保

商”，他们以“泰西诸国”为例，反复指出，

“盖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王韬《弢园尺牍》），而“华官不惟不能助商，反腴削之，遏抑之”（郑观应《盛世危言》三编卷一），造成“上下交失其利”，因此，政府必须革除一切“困商之政”，行保商之法。他们建议：由国家发布行政命令，让各地官员督其所属仿求西方先进技术改进出口商品生产，仿西国恤商惠工之策，调整税率，重征进口货之税而轻征出口货之税，重征洋商之税而轻征华商之税；自铸金、银币；设商部、定商律，颁定各商公司章程；遍立商务和工务学堂以育人才；在国家监督下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商，或成立股份公司，或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等等。郑观应说：“夫如是……上以仰承国家之需要，下以杜绝外洋之卮漏，安见商富而国不富耶？”（《盛世危言》三编卷一）可以看出，上述建议主旨是谋求清政府对民族商品经济进行保护性干预，使处于夹缝之中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得以生存发展。

二

和任何社会思想一样，中国近代“重商”思想也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兴起到系统化的过程，以王韬和马建忠为代表，以马建忠的《富民说》为主要标志。他们主要从流通领域产生的贸易差额来说明富源。其特征是鼓吹商为本，举商务而兴利。这里的“商”主要指对外贸易。因此，可以称之为“商本论”。这是狭义的“重商”思想。第二阶段是其进一步发展到转化的过程，以薛福成、陈炽、郑观应为代表，以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为主要标志。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将

外贸差额的根源归结为生产力的差异。其特征是鼓吹以商为纲，举商务而振百工。这里的“商”不仅指对外贸易，也包括国内商业。因此可以把他们的思想称之为“商纲论”。这是广义的“重商”思想。

对于如何实现以富求强的目的，“商本论”者将“广贸易以重财货”视为根本，过分夸大了贸易的作用。认为“贸易之道广矣哉，通有无，权缓急，征贵贱，便远近，其利至于无穷”（王韬《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弢园文录外编》）。获利在于多卖少买。为此，他们倡导改进生产技术，但其意义只是简单地增加丝茶等传统大宗初级产品的出口数量，弥补外贸逆差而塞漏卮。“商纲论”者则将“增物业”与“广贸易”并列，认识到保护国内市场并使出口货多的必要条件是“振百工”。实际上，这已包含了劳动价值论的某些思想，他们注意到进出口产品的结构以及土货（初级产品）和洋货（加工制成品）在贸易条件上的不平等：一方面，“外洋入口之货，皆工所作成，中国出口之货，皆土地所产”，二者“工绌相越、贵贱相悬”（陈炽《庸书》外篇卷上）；另一方面，“中国以为无用之物，如鸡毛、羊毛、驼毛之类，洋人购之造之，竟成美货……售与华人，其什百千万之利，仍取偿于中国也”（郑观应《盛世危言》三编卷一）。其原因也是西方用机器进行生产。因此，“商纲论”者指出，将土货加工出口可以增加出口货物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用机器生产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利于竞争。他们不再简单地要求增加土货出口，而是进一步要求发展机器加工工业，改变进出口产品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在国民经济中，商非为本而工为本。可见，“商纲论”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生产落

后这一导致民贫国弱的根源，从而较为有意识地把发展资本主义大生产同抵制西方经济侵略联系起来。这是对“商本论”的发展，也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从“重商”转为“重工”的自我否定。

应该指出，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虽然强调生产的作用，但其根本思想并未超出“重商”的范围，是从保护国内市场以塞漏卮，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以致国富的意义上论证的。在他们看来，发展商品生产的意义在于：仿造外洋输入货物，使“彼此可共获之利”而分之；精求中国固有的货物，使“中国所自有之利”而扩之；生产外洋所垄断的货物，以夺“外洋所独擅之利”（参见马建忠《富民说》；薛福成《商政》）。可见，发展商品生产不过是举商务而使出口货溢于进口货，实现聚财、分利、夺利的手段而已。正因为他们把生产从属于流通，所以在论证“百工”的作用及其与商的关系时，他们总是念念不忘地指出：“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薛福成《庸庵全集十种·庸庵海外文编》卷三）这就表明，他们尚未超出从流通领域看待富源的范围。但同时也表明，他们所要求发展的生产，已经不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而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了。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流通领域中的商业活动才能实现价值，从而获得剩余价值，才具有握百工之纲的重要意义。所以郑观应说：“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郑观应《盛世危言》三编卷一）。可以看出，他们所鼓吹的“举商务”，其实质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也正是他们同地主阶级

洋务派经济思想相区别的根据。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与西欧不同，中国近代“重商”思想与西欧近代重商主义有着重要区别。

第一，西欧“重商主义”产生的时代，是西欧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商业资本代表着从流通领域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政权支持下进行海外殖民扩张，因而具有侵略性质。而中国“重商”思想产生的时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抵制西方商品倾销，保护国内市场，就成为民族资本积累和成长的先决条件。它决定了中国“重商”思想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性质。因此，中国近代“重商”思想是进步的。

第二，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尤其是“商纲论”者，在向西方探寻致富之道，进而与之“商战”时，看到了采用机器和先进生产技术的意义。因此，它不象西欧“重商主义”那样，后来成为西欧工业资本发展的思想障碍。相反，它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资本兴起和成长的先声。

第三，与当时西欧商业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占有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相适应，西欧“重商主义”作为封建政权与商业资本联盟的产物，首先以国家政策形式出现，随其推行而系统化为经济学说。由于“重商”政策的成功，“重商主义”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而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资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除了受外国资本的打击和排挤，还受封建官吏的压迫，它只能作为封建关系和外国资本、买办资本的附属物而存在，因而中国近代“重商”思想缺乏广泛而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它没有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也没有对国家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并付诸实践。同时，还应当看到，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当时还认识不到腐朽的封建制度是阻碍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造成民贫国弱的内在原因，而仅仅将民贫国弱归罪于外来经济侵略和清政府的“抑商”政策，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将抵抗外来侵略和反对封建制度结合起来，从而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因而其“重商”思想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改良主义幻想。

（上接24页）

体政策的制定，情况就更为复杂。有了正确的路线，并不等于每一项具体政策都是正确的。有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一旦情况变了，政策就必须跟着改变，否则就成为错误的。有时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如对于当时的情况还认识不清，缺乏经验等，因而没有或者还不可能定出完全正确的政策，甚至定出了错误的政策。有些缺点和错误，还可能不是一次就能彻底纠正的，反复的情况也是会有的。总之，我们党是在土地改革的实践当中，在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断纠正“左”的和右的偏向中，使土地改革政策不断得到修正、补充和发展，逐步完善起来。同样，对于反映土地改革政策的一些历史文件，也不能要求都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应当根据历史事实，同时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等的前前后后的全部论述，去历史地、全面地理解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反映这些政策的文件，敢于正视和承认我们在土地改革当中也和在其他工作中一样，是有过缺点和错误的，有些历史文件也是有缺点或错误的。这样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才符合历史实际，才有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否则，就等于不承认我们的经验是逐渐丰富的，我们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断发展的。